

一张珍贵的照片——《抗战之声》



（资料图片）

1936年8月的一天清晨,斯诺和海德姆在豫旺堡城墙上散步,海德姆观察到斯诺对从保安到豫旺堡的采访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,他对斯诺说:“你从陕北苏区到西征前线,耳闻目睹采访到共产党和红军真实情况,报道出去是投向国民党种种谣言诽谤的一颗重型炸

弹,对中国革命是一大贡献呀!”斯诺回答说:“你能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不也是幸福吗?”海德姆情不自禁地告诉斯诺,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马海德。斯诺听了赞不绝口。

他俩交谈着,来到了南城墙上,他看到:“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,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,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大旗,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,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。”旗套上“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”一行字耀眼醒目。这些战士都是军团部为各师团训练的号兵,他们都很年轻,脸上带着孩子的天真稚气,十分惹人喜欢,红军首长亲切地称他们“红小鬼”。斯诺十分喜欢这些孩子们,他也亲切地称孩子们“红小鬼”,在《西行漫记》中有这样一段描述:“一天早上,我登上豫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里面往下看……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,我就遇见一队号手。这时总算要休息,这叫我感到高兴,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,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,不过是小孩子。因此,

我停下来对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。他穿着灰色短裤,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帽子,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。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褪色的,红彤彤的脸,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。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,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。我想,他一定是非常想家吧。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估计错了。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,而已经是一位‘老红军’了。他告诉我,他今年15岁了,4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。”斯诺看到这是一个好镜头,便拍了一张集体吹号的照片。但他感到不满意,想了一下,对号兵教练说:“请你站到这里来,对着红旗吹号。”教练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,长得很漂亮,是经过长征的老战士。这时太阳从豫旺东塬缓缓升了起来,斯诺感到景色很好,边对焦距边说:“你看着红旗心里想千军万马在你的号声中奔向抗日战场,挺起胸,把军号再举高一些。好,好,你吹冲锋号!”斯诺望着号兵教练全神贯注的神态,仿佛在战场上吹号一样,他非常满意,赶快按下了快门,摄取下了一张珍

贵的照片——《抗战之声》。

《抗战之声》中形象究竟是谁呢?据考证,他就是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的党总支书记谢立全。当时红军各种物资很缺乏,战士们的军装显得比较破旧。8月下旬的一天,与红军对峙的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,把红军筹集的还没来得及上交的200只羊、100多头牛及做棉衣的布匹、棉花全部掠走,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。经批准,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谢立全率领两个连,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,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军师部,营救出了被俘的同志,夺回全部被掠的牲畜、物资,还缴获敌人400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。

这次战斗谢立全荣立战功,上级奖励给他一套新军装。当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情景时,被采访红军的斯诺看见了,一位衣冠整齐、英俊的青年,背着手枪,看样子还是红军干部。他立即让翻译黄华和成仿吾把谢立全叫来,拉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拍照片,留下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。

（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）

固原战国秦长城（一）

长城，是中国古代一项最为雄伟壮观的军事防御建筑工程；它是中华文明的产物，是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重要标志，也是中国留给世界的重要文化遗产。

中国修筑长城的历史自战国开始。各个朝代修筑长城的目的不尽相同，秦汉长城是古代开疆拓土的伴生物，而明代长城则重于防御。长城的构成元素，由外及里分别是：烽燧、壕堑、边墙（含墙台、战台和望台）、障城、关隘、城堡、仓储、驿站、道路桥梁和星罗棋布的驻军城堡。

在我国长城建筑史上，宁夏境内修筑长城时间较早，始于战国时期，修筑长城的里程也较长，是我国北方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宁夏境内战国时期修筑的长城名为战国秦长城。战国秦长城与秦长城，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段的产物，一些关于长城的著述里，或者不提战国秦长城，或者将战国秦长城与秦长城混一表述为万里长城。

战国秦长城修筑的背景

战国秦长城的修筑，与我国春秋时期社会发展进程有密切关系。“春秋之世，田有封洫，故随地可以设关，而阡陌之间一纵一横，亦非戎车之利也。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！至于战国，井田始废，而车变为骑。于是，寇钞易而防守难，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。”（顾炎武《日知录集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

井田制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种

土地制度，井田制的废弃是长城修筑的直接原因。春秋战国时期，井田废而骑兵装备逐渐兴起，各国为满足军事防御的需要，长城修筑应运而生。秦国长城，地域“边于匈奴”。春秋战国长城的修筑反映了一个重大历史背景：一是在军事上兵种、战略战术发生了变化，由之前车、兵协同作战变为以射骑为主。因此，依山势而修筑长城成为军事防御的需要。二是铁器的使用与普及，为长城的修筑提供了物质与技术上的支撑。

春秋时期，各国为了加强防御开始在边境和交通要道上利用险要地形修筑关塞，驻军防守。战国中期以后，各国在边境开始修筑长城，配套修筑亭（瞭望台）、障（小城堡），并设置了报警的烽燧设备，相互间推进军事防御。当时长城可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内地长城，即中原各国之间的长城，修筑的目的是防御邻国军事进攻。一类是边地长城，即秦、赵、燕三国长城的修筑，目的是防御北方草原游牧民族（匈奴、东胡、林胡、楼烦等）的侵扰。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军事防御的重大变化之一，也是战国秦长城在固原修筑的特殊背景和具体表现。

义渠戎国与战国秦长城

战国秦长城的修筑，缘起义渠戎国。义渠戎国建国于西周时期，是远古时期西戎民族的一支。《史记》里有详细记载：“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，而秦稍蚕食，至於惠王，

遂拔义渠二十五城……秦昭王时，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，有二子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於甘泉，遂起兵伐残义渠。於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筑长城以拒胡。”义渠戎受关中农业文明的影响，是一个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。秦昭襄王三十五年（前272），秦国起大军灭掉存在了800年左右的义渠戎国，固原地域纳入秦国版图，属于北地郡管辖，郡治在今甘肃宁县境内，但北地郡最高军事武官——北地都尉却驻防在萧关（固原东南瓦亭、三关口一线）。

秦国攻灭义渠戎国后，在新获得的土地上设置陇西、北地、上郡地方政权建制，并筑长城以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。从筑城背景看，公元前270年，秦昭襄王灭义渠戎国后，“筑长城以拒胡”。秦昭襄王五十六年卒，这一年为公元前251年。战国秦长城的修筑，是在秦昭襄王时期完成的，前后历时19年时间。换句话说，固原战国秦长城始筑在公元前270年前后，公元前251年前已修筑完成。这就是宁夏境内战国秦长城，史家称为秦昭王长城。战国秦长城修筑之所以穿越固原城以北，除筑城的山水地理环境外，义渠戎国时期可能在固原城所在的清水河西岸已筑有城池（堡）一类防御性建筑。

原州区战国秦长城

战国秦长城西起于甘肃岷县，途经渭源、陇西、通渭县，然后转而北上，进入定西市，由静宁县八里镇

解放初期清剿土匪斗争（六）

解放初期，同心、海原、固原等地共有土匪85股，达数千人之众，三五成群，占山为王。他们相互勾结，狼狽为奸，利用地利之便，建立许多秘密联络点，到处流窜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其中，在匪患最为严重的固原、海原地区，马绍武、张海禄是实力最大、作恶最甚的匪首，他们装备有骑兵、火炮、机关枪等，经常流窜于固原、海原、同心一带，打家劫舍，祸害百姓。

匪首马绍武是同心县大沟沿人，早在1936年任马鸿逵部游击队长时，就曾伏击红军部队。由于惯于人民解放军的威力向西北独立第二军投诚，后又率众60余人叛变为匪，与张海禄、李成富、马青云等匪徒合股，盘居于海原县庙山一带，扬言“扫平西海固，打到银川去”。他们拦截宁平公路汽车，抢劫行商骡马，伏击人民解放军驮队，掠取军用物资，反动气焰十分嚣张。

曾任过马鸿逵部旅长的匪首张海禄比马绍武更为狡猾残忍，他懂指挥，善夜战，聚匪反共，造谣污蔑，蛊惑人心，多次血洗基层乡政府。在不到一年时间内，西海固地区先后发生重大被抢劫事件80余件。

针对西北各地匪患严重的情

况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作出了坚决剿灭匪特的决策。宁夏省委和省军区在1949年12月中旬成立了同心、海原、固原剿匪指挥部，全力清剿南山山区土匪。

1950年1月25日，马绍武部匪徒在海原县高崖乡庙山集结。这里地势险要，海拔1700多米，有古刹一座。剿匪指挥部得知情报后，制定了采取突袭、从东西北三面实施合围的作战方案，剿匪部队分别从灵武、定西连夜长途奔袭，于1月27日拂晓赶至豫旺地区，隐蔽待命。后又趁夜幕连续疾行100余公里，到达指定位置，形成合围态势。

土匪借地理优势，居高临下，首先向我军开火。我军用重炮轰击敌山头阵地，马匪指挥部火光冲天，顿时被摧毁。敌匪血肉横飞，鬼哭狼嚎，我军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冲锋，一鼓作气攻上了山头。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，击毙伤俘俘虏土匪近百人，其余匪徒丢盔弃甲，仓皇逃窜。匪首马绍武被击伤后犹如惊弓之鸟，东躲西藏，逃往川口地区。我军指战员顶风冒雪，连续追击7天7夜，终于将其生擒。匪首马绍武被活捉后，其余土匪即刻刻成了无头之蛇，我军乘胜追击，先后在盐池和豫旺地区歼灭了马青云、

郝福祥两股土匪，王彦福等百余名土匪向我军缴枪投降。截至1950年3月上旬，同心一带的马绍武匪匪基本被肃清。

1950年6月12日黄昏，悍匪张海禄部偷袭西山窑乡政府，剿匪部队得知情况后，出兵包抄，但凶残狡猾的匪徒血洗乡政府后迅速撤退溜走。6月14日，张匪又在同心黄谷川一带抢劫。我军两次剿灭扑空。土匪得意忘形，气焰更加嚣张。剿匪部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认为以变应变，以快制快，才能取得主动权。不久，土匪又在海原县兴仁堡抢劫，我军火速出动，紧紧咬住这股抢匪，猛追猛打，从兴仁堡一直追到甘肃省靖远县，土匪惊慌失措，又逃回海原县。剿匪部队又连续追击，土匪又逃回了黄谷川老巢。最终，被剿匪部队逼到了瓦窑河村的一个山洞里。已精疲力竭的张海禄等8名匪徒只得缴枪投降。

至7月底，固原山区的20多股土匪基本上被肃清。

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，其残余势力和特务勾结土匪武装，挑拨民族关系，煽动胁迫群众叛乱，他们围攻县乡政府，杀害革命干部、解放军战士和无辜群众。

移民岁月

第一百一十一期

YI MIN SUI YUE

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（四）——记原宁夏医学院院长陈树兰



上世纪60年代初陈树兰（左）与刘善理一起研究病例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医大学那段时间不长，但很快乐。在学校陈树兰当起读报员，参加过学校组织的演讲比赛，得了三等奖。这是她人生第一次获奖。

1949年3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军医大学部分学员并入了沈阳中国医科大学。陈树兰又和100多名同学一起，转入中国医科大学继续学习。大学生活第二年，文静漂亮、学习刻苦的她成为同桌刘善理心中的女神，在亦学亦友亦兄长般的关怀下，陈树兰收获了爱情。这时的陈树兰每天都被阳光包围，她还当选了团支部委员、化学课代表。花前月下谈论最多的是学好专业，报效国家。

1950年底，抗美援朝开始，很多地方医生都被补充入伍上了前线，国内医学专业人才特别紧缺。按规定医科大学是五年制，为适应特殊的需求，学校让她们提前毕业，直接充实到各地医疗单位。1952年陈树兰结束了快乐的大学生活，走上工作岗位。被分配到卫生部在西安的直属医院，在满怀报国激情中她向老家吉林说了再见，那年她22岁。

陈树兰：大学我们少上了一年，因为抗美援朝开始后，各地都需要医生，所以我们就提前毕业，后来学校

兄弟井

张 昱

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古城墙边，有两口5米多深的水井——大井和小井。大井是供人饮用的，也叫官井，不知是缘于下马关的“关”字，还是因为下马关曾经是县衙所在地的“官”字，井就那样被“关”“官”不分地叫着。官井泛出的水比较甜，出水量大，适宜人饮用，不论天有多旱从来没有枯竭过。小井的水质略有些苦涩，还有些咸，是当地群众用来饮牲口的。

这两口井其实很有些年头了，相传明万历年前就已经存在。离这两口井西面不远，有座龙王庙，和“兄弟井”共同构成了下马关旧城一道独特的景致，有几歌为证：“下马关，有座城，城外面，有口井，挨着井，有座庙，庙里有个和尚，在念经。先有井？先有庙？我不知，和尚也不知……”

大井小井也叫“兄弟井”。之所以叫“兄弟井”，是因为两口井看上去像一对亲兄弟，还因为“兄弟井”周围的好几百户回汉居民、几百年来同住一条街，同饮一井水，尊重各自的风俗习惯，团结就像亲兄弟般。遇有大旱之年，回汉居民互相帮助，互相谦让、每天人挑车拉驴驮取水，共同渡过难关，并及时维护水井。“兄弟井”也就凝聚着下马关回汉群众兄弟般的友谊和感情，传颂着许多民族团结的佳话，其中一段军民一家、亲如兄弟的感人故事至今广为流传。

1936年夏天，西征红军第十五军团在军团长徐海东、政委程子华的率领下，率七十三师、七十五师由宁条梁经大水坑直插豫旺县境，包围了豫旺县城下马关。驻守城内的马鸿逵军想尽办法负隅顽抗，首先从水源下手，派兵把守住官井，封锁了水源，封锁了水源消息，妄想渴死红军，迫使红军撤退，并威胁城内老百姓，说凡有给红军提供水源消息者将以“通匪”论处，严惩不贷。

红军初到下马关，大部队的吃水成一大问题，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。红军只得先寻找那些废弃的水井，修葺取水，以解燃眉之急。

而那些井里的水跟官井的水简直无法相比，苦涩得难以下咽不说，喝久了还得各种各样的怪病，当地有首歌谣形象地形容这种现象：“爹爹有嘴抽不成烟，妈妈抬头看不见天，哥哥有肩不能担，嫂嫂有手不能干。爷爷奶妈难在炕上几十年，只有我弯腰驼背当羊倌”。那样的井水不要说人饮用，牲口喝了都麻得直甩头。为

又把我们那期同学全部招回学校，补课一年。我们是国家第一批统一分配的大学生。毕业前学校天天教育我们，青年人要志在四方，号召我们到边疆去、到艰苦的地方去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，我当时是入党积极分子，在填写毕业志愿时，还专门找了个艰苦的地方，就是大西北。我和刘善理一起报的名，学校把我们分配到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直属医院。到西安后，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还接见我们：“这里就是你们施展才能和实现理想的地方，国家需要你们、西北需要你们、人民需要你们。”到新单位上班时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更好地为人民服务、为国家作贡献，浑身充满着激情和力量，有时候上班连轴转，也从不叫苦叫累。那时还经常学习毛主席《纪念白求恩》那篇文章。白求恩精神也是我更好的为病患服务的一个动力。

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直属医院工作条件比沈阳差了许多，也累了许多，刘善理被分配到西北民族医防队，还担任了副队长，工作地点在阿拉善左旗，为牧民看病，每天骑马在草原上巡诊、为牧民送医送药，出诊时常常是一边挎着医药箱，一边挎着匣子枪，因为当时草原上还有土匪伤人，必须严防，英武的身影中隐藏着更多的是艰辛、劳累与付出，还真有点白求恩同志献身革命和医疗事业的味道。与陈树兰聚少离多，常常靠写信相互寄托思念、送去问候。

陈树兰从迈进西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直属医院大门后，就以勤奋好学、不怕吃苦、兢兢业业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获得病患和同事们的好评，当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，那时候的陈树兰可以说是工作和爱情都在蒸蒸日上。

（蔺银生 撰稿）

了能让牲口勉强饮用，人们只好在水面撒一层麸皮骗牲口，牲口喝几口抬头看看主人，主人再在水面上撒一层麸皮，诱惑着牲口继续喝。

红军一开始吃的这种井水，使许多战士拉肚子，缺水使西征红军陷入生存的窘境，面临着西征以来的又一次严峻考验。

海东等军团首长也一筹莫展。下马关的回汉百姓听说红军是解放自己的救命恩人，看到红军喝着这些又苦又咸的井水，疼得直揪心；很多人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就将官井是甜水、水量很大的情况悄悄告诉了红军。有的百姓甚至冒着生命危险，从家中舀出存贮的甜井水给红军喝。

得到官井情报后，徐海东连夜制定了作战计划，把夺取官井作为攻取下马关的第一战、关键之战，派一个加强连去攻打。战斗打响后，马家军起先抵抗得很顽强，企图拼死守住官井，以实现他们渴死红军、让红军不战自退的妄想。但马匪部队看似人多势众，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，加之守卫官井的头儿一心惦记着城内的家眷和金银财宝，以进城搬搬兵为借口溜进城。守护管井的士兵一看当官的都溜之大吉，遂如鸟兽散逃命去了。

红军顺利地攻占了官井，官井又回到了人民手中。城外的放羊人又能从小井里给羊饮水了，看着羊儿欢快地喝水，放羊人高兴得唱上了千花儿，“青丝麻挽的（者）打鱼网，网么下咧清水的浪上；我和杂妹一样，都走一条路上。”官井也像是很有灵气似的，似乎要为红军、为下马关的解放多作贡献，泛水量非但没有因为取水量增大而减弱，反而更旺，更多了些甘甜。红军喝上了官井又清又旺的甜水，保证了补给，经过休整，于6月27日拂晓发动总攻，一举攻克了下马关城。

多少年来，为保护这两口“兄弟井”，回汉百姓出资并壁箍了又箍，栏杆由青石换成木杆，木杆又做成水泥护栏，直到上世纪80年代，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下马关东部引水工程竣工，人们终于喝上了清甜可口的自来水，但“兄弟井”没有因此而退役，继续担当着羊只牲畜的饮水重任。

今天，“兄弟井”仍然见证着历史的变迁，清甜的井水在不停地流淌，书写着回汉团结友谊和谐的篇章。

（吴忠市政协供稿）